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研究

丁钢著

《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 主编丁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研究

丁 钢 著

《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主编 丁 钢

《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

丁 钢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14,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本

ISBN 7-5320-4816-0/G·4786 定价: (软精)13.50元

本书系国家教委“八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的成果之一，国家新闻出版署“八五”全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之一《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第七种。

序

我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写下这些来推介这部关于国外中国教育研究的专著。近二十年来，我进行了有关中国教育的各种研究工作，并且结识了在欧洲、北美、澳洲、日本及其他国家分享同样兴趣的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研究的学者。我也很荣幸结识了许多关注教育思想与结构等各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

我常常感到的是在研究方面两个世界的隔离，以及很少进行交流与对话。中国的教育学者往往由于外语的缘故，很少有机会研究国外的有关出版物，而国外的学者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研究也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一个已使国外较好了解中国研究状况的媒介物是《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 Quarterly*, Armonk, New York, Since 1968)，在近三十年内，它提供了中文评论与研究的英文翻译。然而，在国外所作的许多研究成果仍未为中国学者所知晓。

因此，丁钢博士在此书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已系统地搜集了国外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文献，按照历史阶段及主题加以分类，并归纳了主要的观点与发现。从中揭示了中外学者在研究结论上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以及中外学者所共同感兴趣的一些方面。

当丁博士作为访问学者参与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

院(OISE)与六所中国师范大学的合作项目(联合博士培养和博士后研究)时,为这部著作所做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进行。我关注了他在北美图书馆搜寻资料的整个过程,并就他所搜集的及注意的各种出版物,与他进行了许多很有兴趣的讨论。他也在美国访问了一些在中国教育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于此期间,在我看来,他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外学术界之间彼此的深刻理解是极富意义的。

作为一位已经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教育历史与传统的论著的历史学者,丁钢的经验与声誉已赋予他一个专家的形象,一位相当杰出的学者。他能够把所作的研究置于对中国多元的教育传统的正确而透彻的历史理解基础上来加以阐述,无论是科举制度还是书院,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保守方面还是道家与佛家思想的激进方面。我高兴地看到这部著作给予三个重要领域以同样重视:教育的传统与价值;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中外交流;以及现代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在邓小平和新的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运动已经赋予中国教育一个复杂的模式组合。在这每一个时期的国外学术研究均有着自身的限定,大量的研究工作已经做出,作为在这部著作中所概括的和批评性的讨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其成果与结论将是非常有兴趣的。

露丝·海霍

序文作者简介

露丝·海霍(Ruth Hayhoe, 中文名许美德)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系主任、教授。先后担任伦敦比较教

育协会主席、联合国比较教育欧洲中心顾问、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处主任、世界银行顾问等职。还担任《比较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等杂志的编委、顾问等。主要学术兴趣是比较高等教育，特别是关于中国教育的研究。著有或编有《中国大学与对外开放》(1989)《教育与现代化：中国的经验》(1992)等，发表有关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

导 言

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教育也致力于自身的变革。为了汲取国际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国教育界也将国际上有关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

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一方面是与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因此，要把握这一研究的过程与特点，首先了解一下国外的中国研究的历史，是必要的。

国外的中国研究，早期主要是依据外国传教士及外交官、海关官员等带去的资料。严格地说，这种研究仅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作知识性的了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中国研究。它导致了外国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种好奇与神秘感，同时也形成了某些偏见。

至19世纪及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武力入侵和文化渗透。为了有效地参与或干预中国事务，国外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相继出现一些汉学家，他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法国遂成为此时期欧洲传统汉学的研究中心。德国此时的在华利益尚不如欧洲的其他国家，相对而言，它较能不受政治利害关系的干扰而对中国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至20世纪30

年代，德国的汉学研究已不亚于欧洲其他国家了。美国随其在华势力及影响的增加，于20世纪初已有8所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及伯克利大学等，开设了东亚研究(包括中国)课程，并都设学位。可以说，此时期有关的中国研究教学课程进入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是国际上的中国研究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一种标志。

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研究在国际上有不同程度的消退。二战以后，国外的中国研究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像法国，从50年代起，在以往悠久的史学传统和扎实的中国研究基础上，开始了系统、科学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那里的有关研究机构也有所增加。德国(主要是前联邦德国)的中国研究更是迅速复兴。1945年仅汉堡、莱比锡及柏林等3所大学设东方学讲座，至1967年已增加到13所大学，到70年代至80年代初已扩展到36所大学。在这些讲座中，尤以关于中国的讲座为最多。日本作为亚洲中国研究的中心，至70年代，已有400余所公立、私立大学开设了有关中国的课程，有120余所机构出版过研究中国的专著，至少有千余名副教授以上或相当水平的专业人员在研究中国。前苏联于50年代也培养出大批研究中国的人员，研究中国的机构至70年代超过20所，并形成了一支千人左右的专业研究队伍。西欧在70年代还建立了统一的研究中国的组织，如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几乎所有的中国研究专家都参加了这一组织。

然而，发展最为迅速的当属美国。经50和60年代的发展，至70年代，那里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及有关的亚洲研究机构，已从原先的5所增加到200所左右。在美国大学中，有1/3开设

中文课程；专攻中国研究的研究生也激增，博士则有千人之多。美国的中国研究得到强大的经济资助，那里还有一些国际垄断资本通过一些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来支持中国研究的国际协作与交流，并给予欧洲等地的中国研究以经费上的资助，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对欧洲产生广泛影响。这一切加上在美国不断涌现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及大批有影响的有关学术论著，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使国际上的中国研究中心迅速从西欧转移到了美国。二战以后国际上中国研究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其重心也有转移。

首先，原先的汉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很早便形成了以中国语言、文化、历史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传统。美国在19世纪中后叶开始了中国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无论其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仍基本沿袭西欧的汉学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历史不甚关注。50年代，法国在纪业马及其他一些汉学家的倡导下，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确立，已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史、中国经济史及中国工人运动史等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正视现代中国，于是在美国政府及以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主的一些财团支持下，美国的中国研究迅速地把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置于优先地位，研究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培训及资料搜集工作在美国内外都有了很大发展。如60年代末欧洲最有影响之一的英国现代中国研究所及其出版物《中国季刊》，以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而著称，它便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筹建的。该所领导人是美国人，而刊物

的编委与撰稿人也大都不是英国人。

其次，由于对当代中国的了解离不开对传统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这种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并且从精英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美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而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并与当代中国的研究相沟通。这使得欧洲原先那种古典式的研究传统相形见绌。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国外中国教育研究的情况。

总的来说，国际上关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是与国际上的中国研究一致的。早期中国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传教士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解、他们在华的传教活动与教会教育。

然而，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教育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是60、70年代才兴起的。此时正值国际上的中国研究蓬勃兴起，而中国也已在教育领域兴起几次改革。同时西方世界经过两次大战后，教育几经变革，陷入了困境，中国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75年美国出版了由富兰克林·帕克和贝蒂·帕克合编的《中国：美国关于外国教育的博士论文目录与摘要》，其中第六卷上、下两册即收入了在美国及加拿大的大学中所完成的339篇关于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教育研究的博士论文。另一美国学者罗伯特·巴伦德森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英文文献目录选注，1971—1976》（1981年），收入的关于中国教育研究的著作、报告及研究论文等，达198种。富兰克林·帕克和贝蒂·帕克在1986年合编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过去与现在的文

献目录选注》，收入了以西文(包括日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教育的论著3053种，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但大多数是50年代以后的出版物。此书出版以后，国际上关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更是发展迅速。笔者从国外最大的教育信息中心——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每年所编的教育文章及摘要中查找了国际上自1986年以来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文章，再加上笔者在北美图书馆所收集的同期出版的有关外文著作，共计已近2000种。其中翻译中文文献的资料书籍有弗雷泽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教育：第一个10年的实录》(1965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及其对教育与社会的影响：文献选注》(1972年)《中国共产主义与教育：文献评注》(1971年)《中国教育与社会：文献指南：文化革命及其后果》(1972年)，塞弗曼与人合编的《趋向一个新的世界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文献史，1949—1976》(1976年)《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文献史，1977—1986》(1987年)，西博尔特编的《中国革命教育：文献与评论》(1971年)，等等。

当然，对当代中国教育研究倾注热情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冷淡。相反，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深入研究，反而激起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更是国外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近现代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更是中外教育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因此连那些专注于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也常常会回过头去寻找历史的线索。

相比之下，国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的研究就显得不够，但随着国际上的中国研究在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方面

的全面推进，随着东亚现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崛起，也由于中国教育变革与其悠久文化传统存在内在联系，国外学者正在对中国固有文化、教育传统产生研究兴趣。但这种研究似已走出了就事论事的古典式研究的圈子，而更注意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揭示传统的涵义，由此也给这一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形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评介国外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研究。这三个方面是：中国教育传统及其价值、中国近代教育与中外交流、中国当代教育与国际关系。

关于中国教育传统及其价值方面，国外除了有一些零星的有关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及人物的论著外，绝大部分的研究比较集中于中国宋代以来新儒家教育思想与实践、书院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等方面。在6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即使对于孔子的教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阻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也仍然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乃至近代社会的变迁为参照系的，他们力求寻找这种教育的本质及它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70年代以来东亚工业文明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儒学内在价值的探讨热情。有不少学者对作为儒学与社会的中介——儒家教育——的内在价值作了重新界说。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肯定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与此相关的，便是国外学者加强了对新儒家教育的研究，尤其是新儒家形成时期的朱熹及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更是受到充分注意。由狄百瑞与查非合编的《形成时期的新儒家教育》(1989年)，将朱熹所创导的新儒家教育与后世的曲解加以区别，并把朱熹的智慧看作是运用传统于当时社会变革之中

的典范,肯定了新儒家教育提倡道德自我更新的内在价值。此外,与新儒学的传播密切相关的新的教育制度——书院教育,自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书院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推广,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的职业化,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等作用问题,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他们倾向于把书院看作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富创造性、最具价值的教育制度。林友春的《书院教育史》(1989年)、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的研究》(1976年)、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1982年)、巴里·凯南《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革,1864—1911》(1994年)、本杰明·埃尔曼《从哲学到语文学:中国封建末期的社会变革与知识分子》(1990年)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关于科举制度,国外学者除有大量散见于各种论著中的研究外,比较集中的研究论著有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1963年)、弗兰克·沃尔夫冈《传统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1960年)、约翰·查菲《宋代中国学习的荆棘之门:科举社会史研究》(1985年)、托马斯·李《宋代的官学与科举》(1985年)等。这些论著着重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科举制度的本质与意义、科举变革与学校教育对中国近代社会乃至西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

在中国近代教育以及中外近代文化教育交流方面,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及教会教育,总是一个令国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它被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工业化世界的最初接触,是中国对西方教育最早的输入,也是西方教育对中国教育传

统的一种挑战。当然，教会教育的宗教目的与渗透的本质，也不时地为西方学者所揭示。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愿意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以及民国初期的大众教育非儒学化的倾向，来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社会变迁的一些内部动因。像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与大众扫盲》(1979年)、保罗·贝利的《改革民众：20世纪初向大众教育的转变》(1990年)等，从民众教育的变化来寻求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教育动因，并归纳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若干进步因素。萨莉·博恩威克的《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纪元的开端》(1983年)则讨论了中国近代新旧两种教育制度交替时期存在的种种问题。

对近代中国一些重要教育人物的研究是国外关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威廉·艾尔斯、本杰明·史华兹、约瑟夫·勒文森、玛丽安·巴斯蒂、威廉·杜克、杰罗姆·格里德、巴里·凯南、休伯特·布朗、珀尔·巴克、查尔斯·海福德、艾恺等，对张之洞、严复、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胡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物展开了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多彩的图景。

关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与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冲突问题，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教育与社会变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切入点。“传统—现代”的关系是这一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它成为大多数有关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如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1970年)、阿部洋的《中国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1990年)、《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摩擦》(1983年)、葆拉·哈勒尔的《播种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与日本教师，1895—1905》(1992年)、巴里·凯南的《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实验：民初政治与教育改革》(1977年)、露丝·海霍与玛

丽安·巴斯蒂合编的《中国教育与工业化世界：文化传递研究》(1987年)等著作，无不如此。

然而，从国际上的中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来看，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研究已在其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是与国际上的中国研究注重当代中国的趋向是相同的。这方面的研究已深入到中国当代教育的各个方面。对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的中国教育，国外学者编译了不少中文文献资料书，从而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他们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变革的关系等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现代中国的教育革命，在国外学者看来是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教育的一种革命。其中既有创造性的建设，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像罗纳德·普赖斯的《中国现代教育》(1970年)、《马克思和苏联、中国的教育》(1977年)、约翰·霍金斯的《毛泽东和教育》(1974年)等，都对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作了专门的考察。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现代中国的教育革命中究竟有哪些新的经验或教训。罗伯特·巴伦德森的《共产党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自立教育机构的最近经验》(1964年)《中国的教育革命》(1975年)及露丝·甘伯的《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1977年)等论著，关心的是现代中国政治变革下的教育新动向，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问题。至于对50年代中苏教育关系问题的研究，更是散见于国外学者众多的论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前30年的教育在认识上有了一些变化。如简·英戈瓦·洛夫斯蒂特的《中国的教育政策：变革与矛盾，1949—1979》(1980年)、西奥多·陈的《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模

式和革命模式》(1981年)、约翰·霍金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与社会变革》(1983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力图对前30年的中国教育发展作出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相比前30年,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仅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为中外教育交流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为国际上的中国教育研究创造了更多、更直接的机会。年长的或年轻的国外学者都有机会来中国作实地考察,亲身体验中国正在发生的教育改革,从而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因此,国外对80年代中国教育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也更为细致而深入,在切合中国的实际上比以往迈进了一大步。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已越来越为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所倚重。

国外对80年代中国教育的研究,其涉及的领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正规教育到非正规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政策到微观的教学改革等,几乎无所不包。但相对而言,比较集中于这样一些方面,即基础教育,包括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普通教育(含九年义务教育)与初等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管理、课程设置与知识组织、招生分配制度改革等;成人教育;师范教育;妇女教育;少数民族教育。苏珊娜·佩帕的《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政策、问题与历史回顾》(1990年)、露丝·海霍的《中国大学与对外开放》(1989年)、露丝·海霍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1984年)及《教育与现代化:中国的经验》(1992年)、欧文·爱泼斯坦主编的《中国教育:问题、政策和展望》(1991年)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